

论王先谦《骈文类纂》的科举教育探索

刘 振 乾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 《骈文类纂》在晚清科举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选本刊刻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制艺之时。王先谦选编《骈文类纂》反思以“古文为时文”给士人带来的思想僵化,提倡以科举策论代替八股制艺。《骈文类纂》指导士人通过广泛涉猎经、史、诸子以开阔视野,提高科举策论水平。王先谦突出选本教育的功能,把守身持正、勤俭养德的思想渗透骈文,倡导士人读书的非功利性。王先谦从自身经验出发,通过科举教育探索,在书院体制下进行选本思想渗透,解决了传统教育与科举制度捆绑问题,从而实现了教育的真正目的。在晚清科举制存废问题上下举棋不定的情况下,王先谦的教育探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 王先谦;《骈文类纂》;骈文选本;科举教育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9)05-0081-06

王先谦《骈文类纂》是一部集大成骈文选本,学术界对《骈文类纂》的研究目前侧重于选本体例、文体理论、骈散关系等方面。本文拟从清代科举制度改革入手,研究《骈文类纂》在科举制改革中承担的书院教育功能。王先谦作为岳麓书院山长,在科举制没有废除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呼吁,力求探索出迎合科举制度改革的骈文选本教材。

一 科举改制与书院教育

《骈文类纂》刊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据李和山先生《王先谦学术年谱》考证: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六十岁,主讲岳麓书院。

七月初一日(8月14日),六十寿诞。本月,辑《骈文类纂》四十四卷成。是编仿姚鼐《古文辞类纂》体例,分为论说、序跋、表奏、书启、赠序、诏令、檄移、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哀吊、杂文、辞赋等十五类,近一千五百篇。先谦自为序例,谈及编纂是书的起因和过程^{[1]204}。

从《骈文类纂》成书时间来看,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刊刻完工与王先谦六十寿诞时间基本吻合。而在王先谦致缪荃孙的书札中,《骈文类纂》的实际整理工作在八年前即已创稿。

谦近刻《日本源流考》《骈文类纂》二书,《类

纂》一用姬传先生《古文辞》例,微有变通,采摭颇广,本前八年所创稿,今更定卒成之。吾弟骈文,务寄数篇或十数篇惠我,书成必速,切盼来函……惟骈文稿请先来,不可耽误也^[2]。

王先谦给缪荃孙的书札透露三点信息:一是用姚鼐《古文辞类纂》体例,微有变通;二是书稿八年前已有草创,后面不断增加新篇目;三是书稿催之甚急,或已明确出书时间。

关于第一点已经无需赘言,王先谦《骈文类纂》序目已经逐条说明。第二点,若以光绪二十七年往前推八年,那么《骈文类纂》初创于光绪十九年(1893),是年“叶德辉时回湘不久,自此与先谦交往逾密”^{[1]161},故《骈文类纂》序目云“叶(德辉)张(祖同)之力为多”^[3]。第三点,光绪二十八年思贤书局四十六卷本序目及《王先谦自定年谱》明言“序跋类四”“铭箴类一”,而《骈文类纂》内文列“序跋类五”“铭箴类二”,全书内文卷数与序目卷数存在两卷出入,这种前后不统一的编校错误,显然是因追赶工期所致。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王先谦急于将《骈文类纂》刊行于世呢?本文认为《骈文类纂》的刊刻缘起于戊戌年间的关于科举制变革的反复。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五日,清德宗上谕:

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试场献艺,大都循

[收稿日期] 2019-06-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骈文研究文献集成”资助(编号:15ZDB068)

[作者简介] 刘振乾(1985-),男,湖南邵阳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题敷衍,於经艺罕有发明,而謏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源同流,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①。

维新变法以慈禧太后政变而宣告失败,光绪皇帝旋即被囚禁瀛台,之前颁布的多项新政也多被废止。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宣布懿旨:

近来文化日陋,各省士子往往剿袭雷同,毫无根柢,此非时文之弊,乃典试诸臣不能厘正文体之弊。乃论者不揣其本,辄以所学非所用,归诸于立法之未善。殊不知试场献艺,不过为士子进身之阶。苟其人怀齐抱伟,虽用唐宋旧制,试以诗赋,未尝不可得人,设论说徒工,心术不正,虽日策以时务,亦适足长器竞之风。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②。

对于宫廷斗争中这场关于科举制改革的反复无常,王先谦一直保持密切关注。《虚受堂文集》(卷一)有王先谦作于戊戌年间的两篇时论:《科举论上》《科举论下》,文章并附有王氏自作题序,介绍文章的写作背景。

《科举论上》:光绪丁酉戊戌间,时文之敝极矣。群议变科举法,予亦赧之,作科举论上^{[4]29}。

《科举论下》:光绪戊戌夏,奉旨废制艺,试策论。已而康有为逆案事觉,新政复旧,作科举论下^{[4]32}。

在《科举论上》中,王先谦首先明确指出科举制弊端已经到了势在必革的紧要关头。“一统之天下之士,以制艺造之;列国之天下之士,不可以制艺造之。今之世论海内则一统,合环球为列国。然而设科校艺,懷仍前政,用时文取士,而罔识变通,殆未抉其弊也。”^{[4]29}王先谦认为,自宋明以来,科举取士制度递相沿革,在人才选拔方面已经比较周密了。如果国家没有出现外忧内患,科举制度不改革也是可以的。“果无外惧,百世不易可也。道咸之际,知有海国矣,情事未灼也。同光以来,知列国所以驾吾上者,端绪可究矣,而势弗棘也。……由其道而人才日出乎其间,虽不改制科无害也。自日本之役,国威不张,列邦劫持,财力殫竭,岌岌如不终日。”^{[4]30}正因为外来势力的入侵,导致国家岌岌可危,必须通过选拔人才来进行自救,因此科举制改革迫在眉睫。

那么科举制究竟要如何改?王先谦在《科举论

上》中也提出“以策论代制艺”的方案。关于“策论”,王氏还作出详细解释:

文之为道,所以化成天下,历千万祀不变也……吾为士人议废此者,专欲嗇其精神,优其日力,多读有用之书而已。若夫策论,以存古文之学,则亦不能废也……用四书之题目,易策论之体裁,如宋王安石创始之作,虽废犹不废也。充之子史,以博其趣;推之时务,以观其通……性理之说,有穷者也;经、史、诸子、时务,无穷者也。论无穷之与有穷,固有间矣。三场策近考据之文,殿廷策取对扬之义,视散文为策,抑又不同。夫策论,统词耳^{[4]31}。

王先谦在这里虽然探讨的是科举考试,但实际上涉及的是“文”的概念和“读书”的问题。显然,王氏所谓的“文”已经不局限于古文或者散文,而是包含“骈文”在内的广义的文。同时,其所指“策论”也与“以散文为策论”的观念有区别。因此,在科举备考方面,以“四书五经”作为考试书目,以“古文为时文”的八股制艺,已经不合时宜。由于改革之前的科举考试三场本身就包含“策”,故王氏特别提出“三场策”与“殿廷策”的不同。即前者近“考据”,后者取“对扬”;前者为“散文”,后者统归“骈散”。

在《科举论下》中,王先谦首先指出凡事不能一概而论。科举制改革并非康梁之首创,不能因为维新党被挫败就停止科举制改革的步伐,更不能开历史倒车,一复其旧。其次,王先谦认为四书制艺之优劣与道德品质之优劣并无必然联系,王氏以康有为例,认为“其心已悖乱,虽日诵其文而精其技,未见果有益”。再次,针对考试公平问题,有人认为制艺只需要反复揣摩四书即可,而策论则需要博览群书,寒门子弟因买不起书而知识面窄,无法出人头地。王先谦认为,“吾闻立政者,以育才为亟,不闻教学者以恤贫为先。子何论之卑也”。王氏的立论虽是从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角度出发的,但他显然也看到了问题所在。因此,编纂一部谘裁经史、诸子、时务的骈文选本,既开阔士人眼界,又减轻寒门学子的经济负担,作为书院山长,王先谦义不容辞。因此,王先谦在《科举论下》云:

今天下所当究图者甚众,徒各执其咫闻隅见,胶固于心胸,而莫能相发,此人才所以日乏而世运所以不振也。且制艺之宜更定,舒赫德、杨述曾言之于乾隆时,李相国言之于光绪初。朝廷虽不从,未尝加遣也。今之时,诚急于舒赫德、杨述曾、李相国言事之时矣^{[4]33-34}。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这场国耻巨变让清朝统治者重新拾起戊戌年间

被搁置的科举制改革议题。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十六日清政府下诏:

著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③。

从时间上来看,《骈文类纂》的成书时间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这道诏书正好吻合。更有意思的是,光绪二十七年九月,王先谦编纂的《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亦已刊行,是书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自日本建国至明治二十六年的历史,这或许可以填补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中日本政治史的空白。由此可鉴,集教育与出版于一身的王先谦,在刊选题上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其目的就是通过选本教育来影响士人的知识结构,从而更好地适应科举制改革的要求。

二 策论范本与学术门径

从戊戌变法期间的“一律改试策论”到百日维新之后的“悉照旧制”,再到光绪二十七年重启科举改革“不准用八股文程式”。这中间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改革只改“八股制艺”而不革“科举制度”本身。虽然“以策论代制艺”是众多有识之士的一致看法,但是“策论”究竟该怎么写?如何来命题?仍然处于摸索当中。但从戊戌年间光绪的上谕和慈禧的懿旨中对比可以发现:“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近来文化日陋……乃典试诸臣不能厘正文体之弊”,两者都把国体弊病转嫁到文体弊病上来,而指向文体弊病的矛头又无一例外的指向所谓的时文制艺——八股文。

孟伟在《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与文学批评研究》中指出:科举考试是清王朝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广大读书人的终极理想。清代教育以科举应试为最终目标,而时文也即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最主要的文体,是清代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在科举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要想提高八股文写作水平,古文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古文选本作为广大士子学习古文的必读之书,成为清代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清人所编选的选本数量众多,影响广泛,从其编

选和评点情况来看,都与科举考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5]。

就古文选本而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桐城派姚鼐《古文辞类纂》,王先谦于光绪八年亦编《续古文辞类纂》。单以科举“策论”而言,姚鼐《古文辞类纂》奏议类包含了一部分对策,其序目云中:

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6]。

《古文辞类纂》“奏议类下编”选董仲舒对贤良策三篇,苏轼、苏辙兄弟时务策十六篇。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奏议类不续,并说明了不续之理由:“今之奏议要在明切事理,古义美辞所弗尚也。体既专行,不入兹录。”^[7]《骈文类纂》替“奏议类”为“表奏类”,王先谦序目中云:

制策发问,炎灵肇端,历代循其体,又有奏对、策对之异焉。本朝革华崇实,凡有进御,统谓之奏,平论大政,亦或用议,成书贺捷,皆上表文。殿试、朝考分题策疏。观乎人文,取存古式而已^{[8]7-8}。

《骈文类纂》在“表奏类九”中专设奏对体,选中山靖王《闻乐对》、挚虞《日食水旱对》、樊逊《升中纪号对》、《求才审官对》、《释道教对》、《刑罚宽猛对》、《祸福报应对》、张说《文标词苑科策对》、张昌龄《刑罚用舍对》等九篇。从选文和作者可以看出,以“策对”为题的只有张说《文标词苑科策对》一篇,此文《张燕公集》标题为“词标文苑科策”,《全唐文》标题为“对词标文苑科策”。《骈文类纂》题“文标词苑科策对”或系刊刻之讹误。《新唐书·张说传》:

张说,字道济,或字说之。其先自范阳徙河南,更为洛阳人。永昌中,武后策贤良方正,诏吏部尚书李景谌糊名较覆,说所对第一,后署乙第,授太子校书郎,迁左补阙^[9]。

据今人熊飞考证,“张说实际参加了一次科举之两场考试,一个是笔试,在永昌元年,留下了三道答卷;一个可能是口试,在载初元年,无答卷保存下来”^[10]。为了体现这份对策的完整性,《骈文类纂》在收录张说对策的同时,将朝廷的提问也一并录入。三道问题均以“朕闻”发问,三道对策以“臣闻”开题,以“臣谨对”收尾。王先谦在这里举盛唐科举对策为例,其目的与《古文辞类纂》遍举北宋二苏对策为参考范文不同。王氏更多的是对“光绪上谕”“慈禧懿旨”中关于“文体日敝”“文体之弊”的一种反思。既然“时文制艺”是因学习模拟唐宋八大家的

散文而走向僵化,进而导致国家人才的萎靡不振,为何不把目光放到科举制肇兴的初盛唐骈体文,看看最初的科举策论是如何出题,如何对策。这实际上也是在暗示执政者反思科举初衷,国家对人才选拔的引导机制是否出了问题。以下略举这三道问题:

第一问:朕闻立极开基之主,经文伟武之君,莫不法象殊流,污隆异制。……适时之务何先?经国之图何最?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

第二问:朕闻礼崇三典,方宏慎罚之规;书著五刑,不以深文为义。……岂止杀之方,乖于折衷?将小慈之泽,爽彼大猷?

第三问:朕闻仰观乾象,房心为布政之宫;俯察坤元,河洛建受图之所。……未知何代之政?参详适中;何礼之规?施用为切。

显然,这三个问题在治国理政层面都已经站到了国家的顶层设计高度,而不是空谈儒家理学的性道天理;考察的内容范畴也已经超出了儒家的四书五经,经、史、诸子百家的王霸杂说无所不包。从文体的层面来看,这种宏大的骈体叙述具有雍容典雅的语言仪式感,选拔出来的人才也堪称大手笔。莫道才教授在《骈文为何能长期存在》一文中指出,隋唐以后,随着选拔朝廷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而带来的科举试策用骈体和律赋用骈体,骈体又进一步影响文人的日常写作。骈体作为应试文章之文体方式,目的是了解举子是否具备写作朝廷公文及一般官方文书所需要的文体技巧。……这就说明骈体具有的语言仪式感是骈文长期存在和兴盛的最重要原因^[11]。

当然,王先谦编选《骈文类纂》的初衷绝非单纯为士人提供一个学习文体技巧的范本,其真实的目的还是要引导士人多读书,因为任何模拟借鉴都会走向思想僵化和千篇一律。纵观《骈文类纂》,经、史、子、集四大部头的基本书目均有覆盖。以论说类为例,《骈文类纂》涉及的书目就有《文心雕龙》《史通》《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晋书》《旧唐书》《新唐书》《元史》《明史》《抱朴子》等,对文学和历史的整体性把握有利于开阔士人在策论中的宏观视野。在序跋类中,王先谦更是穷尽毕生之搜罗,对各类总集、别集、学术著作等以选辑序跋的方式进行简要叙录存目,如《文选》《玉台新咏》《唐骈体文钞》《皇朝文选》《宫闱文选》《十家四六文钞》《宋元四十家词》《十六国宫词》《四六丛话》《梁武帝集》《昭明太子集》《上官昭容集》《陶渊明集》《王文宪集》《赵国公集》《洛阳张司马集》《翰林学士江简公集》《湘筌阁诗集》《林玉岩

诗集》《诗品》《书品》《尚书大传疏证》《史记引尚书考》《戴氏遗书》《大唐西域记》《三国疆域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等,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事实上,《骈文类纂》中罗列的书目还只是举借前人或他人的著述成果,王先谦自己也是一位淹博经史、著述等身的学术宗师。其在经学方面的著述有《尚书孔传参正》(36卷)、《诗三家义集疏》(28卷)、《释名疏证补》(8卷)、《皇清经解续编》(1430卷);史学方面的成就有《东华续录》(419卷)、《汉书补注》(100卷)、《后汉书集解》(120卷)、《合校水经注》(40卷)、《日本源流考》(22卷)、《五洲地理志》(36卷)、《外国通鉴》(33卷);在诸子学方面的成果有《荀子集解》(20卷)、《庄子集解》(8卷)、《管子集解》(22卷)。虽然这些学术成果有些是在《骈文类纂》编纂之前就已经刊刻出版,有些是在《骈文类纂》编纂之后才刊刻成书,但是这足以证明,王先谦本身的学术储备厚实。正因为有如此深厚渊博的学术功底,才能够高屋建瓴为士人指导读书门径,从而培养出不拘一格的救国人才。

三 读书养性与道德追求

明清两代的八股文都以“代圣人立言”自命。虽然戊戌年间光绪帝上谕改试策论,但仍然指出“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光绪二十七年废除八股制艺,四书五经同样也还是必考科目。王德昭在《清代科举制度研究》指出:

清承明制,以科举为抡才大典,学校储才以应科举,而取士用四书文,自亦有其宗旨。传统的政治社会体制所要求于臣民者,首要在于作忠臣孝子,而忠孝为儒家所阐扬的伦理之本^[12]。

事实上,王先谦在光绪元年典试江西时对制艺取士也是颇为称道的,其《江西乡试录》前序对李鸿章提出的废制艺之疏不以为然,认为“法屡更,则国是纷;教不一,则民志惑。”当时的王先谦三十四岁,仕途高歌猛进,对制艺取士尤赞赏有加:

臣维文与时为变通,而制艺取士,前古莫尚之良法也。圣贤之微言奥理,备于四子书。学者正心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舍是无由。自朱子《论语》注,又从《礼记》中摘《大学》《中庸》为章句,配以孟子,题曰《四书》。苟无制艺,则其书与诸子等耳。上好刑名,人师申韩;崇虚无,人讲庄老;进诗赋,人习潘谢曹马。以制艺取士、四书命题,然后斯世尊奉一致,口复心研,不能自己^{[4]45}。

然而二十四年之后,王先谦以在野之身重新审视国家所处的岌岌可危之势,对科举制艺的弊端有

了一种新的权衡。其在《科举论下》中就以“制艺之益”批评以康有为首为首的维新党人:

制艺之益,予固言之矣。然必以人才兴起之益,专归之四子书与制艺,彼康有为之徒,皆习四子书由制艺出身者,又何说也?夫其心已悖乱,虽日诵其文而精其技,未见果有益也^{[4]33}。

光绪元年的王先谦和光绪二十四年的王先谦在四书制艺上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年届花甲的王先谦作为岳麓书院山长,在书院教育问题上已经超越了科举仕途功利,而是着眼于培养能够安贫乐道、守身持正的君子德行。

《骈文类纂》“论说类三”中选李康《运命论》,韦曜《博奕论》,嵇康《养生论》,潘尼《安身论》,葛洪《抱朴子外篇尚博》《抱朴子外篇守壻》《抱朴子外篇安贫》《抱朴子外篇博喻》《抱朴子外篇广譬》,刘峻《辨命论》《广绝交论》,卢思道《劳生论》,李德林《天命论》,乐钧《广俭不至说》等十四篇。对比李兆洛《骈体文钞》(卷二十)“论类十四篇”,两书重复之文有《运命论》《养生论》《安身论》《辨命论》《广绝交论》《劳生论》《天命论》,王先谦增选葛洪《抱朴子》五篇以及韦曜《博奕论》、乐钧《广俭不至说》两篇。从增选的篇目中可以看出,王氏不仅突出子书对士人进德修身的重要性,而且勉励士人要业精于勤、持俭养德。如《抱朴子尚博》篇云:

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则林薄之稗蒿岳也。虽津途殊辟,而进德同归;虽离于举趾,而合于兴化。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焉^{[8]135}。

又如《博奕论》云:

历观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积累殊异之迹。劳神苦体,契阔勤思。平居不惰其业,穷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于耕牧,而黄霸受道于园囿,终有荣显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于夙夜,而吴汉不离公门,岂有游惰哉^{[8]131}。

士人以科举为晋升权贵之门的阶梯,把四书五经当作荣华富贵的敲门砖。这种功利性的读书会造成两个极端:一方面,成功走上仕途的读书人对圣贤之书“弃之如敝履”,逐渐沦为利欲熏心的悖乱之臣;另一方面,科场失意的读书人抱怨怀才不遇或时运不济,甚至成为离经叛道的强盗贼寇。因此,王先谦把养德作为读书的要义,尤其推崇道家这种清心寡欲的非功利性读书,这也是《骈文类纂》甄选葛洪《抱朴子》外篇五文的重要原因。

此外,为了教育士子在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

之后不贪恋权位,做到谦恭辞让、淡泊名利,王先谦在《骈文类纂》“表奏类七”卷数设计做了精心布局。《骈文类纂》“表奏类”共分为九卷:表奏类一主劝进,收文6篇;表奏类二主论政,收文9篇;表奏类三主荐劾,收文10篇;表奏类四主进献,收文21篇;表奏类五主贺庆,收文12篇;表奏类六主谢赐,收文14篇;表奏类七主让谢,收文40篇;表奏类八主求请,收文10篇;表奏类九主策对,收文9篇。为了均衡每卷篇目,表奏类七分卷上、卷下两部分。从数量上可以看出,王先谦此处有意突出“让谢类”。如江淹的《为萧公让太傅扬州牧表》《为萧公重让扬州表》《为萧公三让扬州表》,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沈约《为柳世隆让封公表》,庾信《为阎大将军乞致仕表》《为杞公让宗师骠骑表》《代人乞致仕表》,徐陵《让五兵尚书表》《为始兴王让琅琊二郡太守表》《让散骑常侍表》《让右仆射初表》《让左仆射初表》《为王仪同致仕表》,李峤《为王方庆让凤阁侍郎第二表》,韩愈《为裴相公让官表》,陶宏景《解官表》,王僧孺《为韦雍州致仕表》,温子升《为西河王谢太尉表》,李邕《谢入朝表》,欧阳修《谢致仕表》。

上述表奏或替人所作,或为自己所作;既有出于礼节性的客套话,亦有发自肺腑的诉衷肠。故王先谦在《骈文类纂》“表奏类”序目云:

位禄与共,辞受揣分而让谢兴;上膏犹屯,下情待抒而求请起。王廷有扬,词笔兼需而对问重,流观天泽,义云备矣。竹弹鲋谢,词诡体正,通天之奏,故土有怀。比士衡之吊魏帝,尚蓄余思;似稚圭之祷汉宗,申衷冥漠^{[8]序目8}。

王先谦的“位禄与共、辞受揣分”思想对于学子想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是一种鞭策。为官一任,不贪权,不恋栈,既不能尸位素餐,也不要抱非分之想。然而时势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宣布新政废除八股制艺,《骈文类纂》刊刻成书,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谕令“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在八股文废除后的五六年间亦寿终正寝。虽然读书人的科举仕途梦想破灭了,但王先谦的《骈文类纂》在清末民初一直流行不衰,这说明《骈文类纂》的选本价值已经超出科举制度的范畴。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科举教育是伴随着科举制度而存在的一种教育机制,科举制的改革存废对科举教育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王先谦对科举教育的探索,深

刻影响了岳麓书院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同时也影响了晚清时期的湖湘士风和学风。《骈文类纂》是王先谦科举教育探索的一种策略,在刊刻之初具有投石问路的效果。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骈文类纂》摆脱了科举制的束缚,成为晚清士人的一部学术选本和思想选本。简而言之,读书人通过阅读该选本不仅学会如何为官,学会如何为学,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为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从现代教育理念来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总目标。为学和为官是总目标的两条分支,这两条分支既可以交叉也可以平行。王先谦从自身经验出发,通过科举教育探索,在书院体制下进行选本思想渗透,最终解决了传统教育与科举制度捆绑的问题,从而实现了教育的真正目的。王先谦的科举教育探索有别于维新派的极端改革路线,属于温和改良方案。在晚清科举制存废问题上举棋不定的情况下,王先谦的教育探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方面,王先谦为近代湖南书院教育向学堂教育过渡创造条件,《骈文类纂》在学术和思想上提供了充分的知识储备,使得一大批湖湘士人在科举制废除之后能够顺利适应新学制教育,并且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王先谦的科举教育探索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骈文类纂》尤其是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进行思想渗透,使得以培养服务帝王或朝廷的科举教育理念转化为服务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教育理念,从而使得湖湘人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更坚定彻底。

注释:

①《清德宗实录》卷四一九,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丁巳(初五日),谕内阁。

②《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八,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乙巳(二十四日)下。

③《清德宗实录》卷四八五,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乙卯(十六日),谕内阁。

[参考文献]

- [1] 李和山. 王先谦学术年谱[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 [2] 顾廷龙. 艺风堂友朋书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3.
- [3] 王先谦. 清王葵园先生先谦自定年谱[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313.
- [4] 王先谦. 虚受堂文集[M]. 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
- [5] 孟伟. 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与文学批评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6-17.
- [6] 姚鼐. 古文辞类纂[M]. 胡士明,李祚唐,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序目5.
- [7] 姚鼐. 正续古文辞类纂[M]. 王先谦,选编.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76.
- [8] 王先谦. 骈文类纂[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 [9] [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4404.
- [10] 熊飞. 张说生平若干问题考遍[J]. 文学遗产,2015(4):182-184.
- [11] 莫道才. 骈文为何能长期存在[N].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018-02-26.
- [12] 王德昭. 清代科举制度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1984:121.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Education Exploration of Wang Xianqian's Pian Wen Lei Zhuan

LIU Zhen-qian

(G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Pianwenleizhuan came into be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of science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ng Xianqian's Pianwenleizhuan reflects on the rigidity of the thought brought to scholars by "ancient prose as a time text", and advocates replacing the eight-part system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trategy theory. The Pianwenleizhuan guides scholars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nd raise the level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policy theory by dabbling extensively in classics, history and books. Wang Xianqian highlighted the function of choosing this education, adhered to the idea of upholding integrity, frugality and morality permeated parallel prose, advocating the non-enrichment of scholars reading.

Key words: WangXianqian; Pianwenleizhuan; Selected Parallel Essays; Imperial Examination Education